

夜光杯

醉里谈诗

陈鹏举

诗是梦境。诗人是活在梦境里的人。这一点应该可以肯定。原先总说诗和酒有关，所谓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，其实是一种误会。古时候的酒，酒精度不高，喝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。也就是喝多了，有些迷糊的感觉，有助于入梦而已。酒一定不是诗人写诗的密钥。主要成就诗和诗人的，只能是梦境。

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、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”，杜牧的“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”、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李商隐的“瑶池阿母绮窗开，黄竹歌声动地哀”，王昌龄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”，哪一句写的不是梦境，或者说哪一句不似梦中所得？

李白写庐山瀑布，说是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大家去看了，都认为不是这回事。瀑布很小，是否李白那时候大呢？即使大，也不至于银河的模样吧？说是李白用了夸张手法，这说法哪像是在说诗？诗人写诗会想到手法吗？从来不会。

诗人写诗，是在人生和万象之间寻找一种美的关联。这种关联只有在梦境里，才可能完美。李白在庐山看到瀑布，他突然就入梦了。他在他的梦境里，看见好大好大的瀑布，感觉就像银河落了下来。李白是天人，他感觉瀑布一定和银河有关，就像他写黄河，就会写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一样。到过壶口的人，同样知道黄河不如诗来得壮观。但几乎没人质疑李白的这句诗。因为黄河是母亲河，人人都愿意相信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。

有所思，有所梦。梦境的美在于，它来自经验里的人事、情景，又把这些人、情景重组了，一切美不胜收。李白没去过蜀道，就是他写了《蜀道难》，而就是这篇《蜀道难》，让他一时间名满长安。那时候是诗的年代，长安的诗人好多，长安就在梦境里。

杜甫是伟大的诗人，他一生在自己的梦境里。他的《绝句》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每一句都是经验里有的，只是在梦境才可能一字不差地出现。他的《登高》：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是唐人写得最好的一首七律。他登上白帝城外的高台，他笔下所写的，是一个老病潦倒的诗人，梦想中依然不朽的山河。杜甫最伟大的诗篇是他的《秋兴八首》。《秋兴八首》，是诗人和诗留给了后世的伟大梦境。家国人天，顺遂艰苦，在杜甫的梦境里，深情著白，气象万千。杜甫之后，这种梦想的力量，诗的力量，几乎不再见到了。

说到诗是梦境，还要提一下李贺。他一直活在梦里，活了二十七年。他的诗，几乎是梦话。“茂陵刘郎秋客，夜闻马嘶晓无迹。画栏桂树悬秋香，三十六宫土花碧。”随手录上几句，就跌入他的美梦了。

巴黎的马尔克斯

邵毅平

我年轻时就读过马尔克斯——当年又有谁没读过他呢？一头母牛出现在族长家的阳台上，咀嚼着天鹅绒窗帘，欣赏着落日；已有几个世纪了，人们搞不清楚族长是否还活着……可我没想到的，过了那么多年，我竟然还在读他，一直读到几年前的一天，我在巴黎触摸到了他。

1955年，作为一家报社的记者，马尔克斯被派往欧洲。翌年，因报社遭到查封，他失去了生活来源。于是他就像当年的海明威，年轻而贫穷，在巴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。我寻觅兰波住过的克吕尼旅馆时，曾路过其隔壁的三学院旅馆，旅馆门口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马尔克斯1957年在那儿住过。那家旅馆位于居雅街靠近索邦那头，离圣米歇尔大街及卢森堡花园不远。马尔克斯大概经常出没于那一带，就像三十多年前“巴漂”的海明威，而后者正是他当时的偶像之一。直到有一天——

“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，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，他和妻子玛丽·韦尔什经过圣米歇尔大街。他在街对面往卢森堡花园的方向走，穿着破旧的牛仔帽、格子衬衫，戴一顶棒球帽……他已经59岁了，体格壮硕，想不看见都不行……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出来的大批学子当中，他显得生气蓬勃，想不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。”

马尔克斯用双手围成喇叭，向街对面的人行道大喊：“大——师！”海明威明白在人群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，就转过头来，挥了挥手，也用卡斯蒂利亚语对他大叫：“再见，朋友！”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。

我也无数次走过圣米歇尔大街，大街相当宽阔，尤其是接近卢森堡花园的那段。我不禁好奇，他俩得使多大劲，才能让彼此听见？

马尔克斯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海明威。这次邂逅给了他一种感觉，曾经有什么出现在了的生命里，从此就没有消失过。后来

他还发现，世上所有的地方，只要海明威写过，就会被他占有，被他赋予灵魂，哪怕在他死后，仍带着这种灵魂，独自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成为海明威的风景，时时刻刻都属于他。

巴黎也是这样。马尔克斯后来回忆，曾有许多日子，他就像海明威一样，在圣米歇尔广场的咖啡馆里看书，觉得那里温暖而且友好，令人惬意，适合写作。他总希望能再次见到那个俊俏清新、黑发如乌鸦翅膀般斜掠过脸庞的姑娘，海明威用他那有力的文笔占有了她：“你属于我。整个巴黎也属于我。”每回经过奥黛翁街12号莎士比亚书店旧址，他都会看到海明威和毕奇在业已消失的书店里聊天消磨时间，直到傍晚6点，乔伊斯可能正好路过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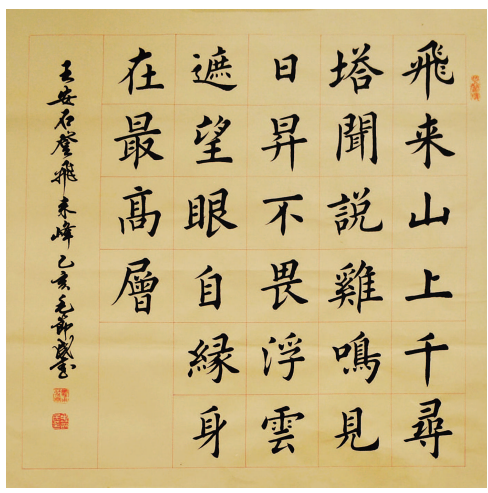
对许多人来说，一座城市，一个地方，只有与他喜欢的人事有关的，才可能具有意义，其余的都不存在。就像捷克的赫拉巴尔来到伦敦，只在乎与艾略特有关的景点，每到一处便整段诵读《荒原》。马尔克斯所述的这些场景，源自海明威的《流动的盛宴》，其中充满了迷人的个人色彩，让巴黎盖上了海明威的印记。马尔克斯一定熟读了它，然后在揣着它重访巴黎，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想象里。马尔克斯说过，长年阅读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对他又如此热爱，会让人分不清小说和现实。

另一方面，《流动的盛宴》始撰于1957年的秋天，就在巴黎大街上那次邂逅后不久。那个年轻的用西班牙语喊他“大师”的崇拜者，是否让海明威闪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，触动并打开了他回忆“巴漂”往事的闸门？然而马尔克斯不知道的是，那个曾经属于海明威的巴黎，因为他的生动描述，现在又重叠上了他的身影，让后来者既看到了海明威，又看到了他。这就像中国诗人说的：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”对马尔克斯来说，那个早晨昙花一现而又永恒不灭，在那个春雨潇潇的5月天，海明威隔着大街对他喊：“再见，朋友！”而对所有的文学爱好者来说，那样的场景也已经成为经典，就像在5月巴黎中午的阳光下，斯万夫人站立在宛如紫藤绿廊的阳伞下，在斑驳的光影中与小马塞尔谈话一样。在暗香浮动的5月的巴黎，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幸运，在大街上邂逅一次那样的风景，尽管我已不再年轻也说不上贫穷。

二十多年前在甘南玛曲见到黄河，这里是她于茫茫河滩起于玛曲草原的第一弯。从县城到黄河边大约需要45分钟，草原上没车，去那里全靠两只脚。途中还遇到藏獒追赶我们，好在我用了声东击西之计，总算脱了险。当气喘吁吁赶到黄河边，看到那条悠悠地从这里拐过来的接近土色的河流时，忽然被那种平静、毫无张扬、不紧不慢的淡定怔住。太朴素、太平常了！难道这就是我心中伟大的黄河？难道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？我坐在黄河边思考着。黄河在这段水域很宽阔，静静地朝东流淌，不时闪出一个个小浪花，让你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平常心。仔细想想，黄河具有敬畏山川的谦逊；黄河为我们灌溉良田，孕育生命。那是一种默默的奉献，是一种平凡的伟大。

我在宁夏中卫又见到了黄河。不过是在流淌中闪过一两朵浪花，她还是那样默默的、毫不张扬。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。



毛节民 书法

从玛曲第一弯到中卫的沙坡头，我不知道黄河究竟拐了多少弯？书上说九曲黄河十八弯，我没有细究。但是黄河在中卫这一拐，却是道出了无限生趣。我不知道丝绸之路是否经过这里？然突厥、鲜卑、党项人肯定在此有过

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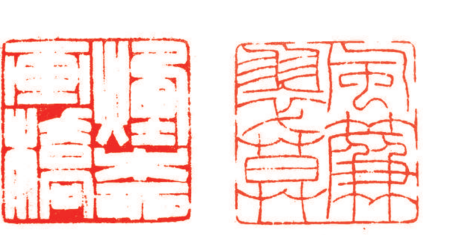
黄阿忠

活动，西夏王国也一定和这里有关系。不然，两岸蜿蜒的山岩怎会读出那些沧桑，又怎能感悟到历史的留下的印痕？默默流淌的黄河在山体、平原中穿行，见证了历史的变迁；黄河没有寂寞，群山为她行注目礼，哗哗的水流声向她问候，弯道是不会错过风景的。

我想，黄河在中卫的拐弯或许是为了积蓄，让河流缓缓地等待后来的水流，积蓄更多的水量，再冲向下一个弯道。在黄河上有许多水电站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弯道蓄水这个原因。当黄河流到陕西、山西的壶口时，由于地势

的落差而形成瀑布，因为蓄水产生的力量，使黄河沸腾；由于积累的碰撞，使黄河激昂。我们常常把黄河比喻中华民族，或许就是力量、沸腾、激情的民族精神，中原文化源远流长，黄河象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。我想，拐弯、停顿并不是什么倒退，而是积蓄力量，为下一次有更大的崛起。

黄河边常常能见水车，中卫沙坡头可能更多，那是黄河边的一道富有生趣的风景。水车或许是根据水量的多少而安置的。我想水车一定有两三千年历史吧，不然的话，万顷良田的灌溉怎么能实现？水车是利用转动将水传送灌溉，而制作水车，又体现了古代的工匠精神。水车的轴距、轴承的运转，带着挡水板，其制作需要精湛的工艺。或许，这个水车是被我们称为工匠祖师爷的墨子发明的。三国时代诸葛亮设计制作作的“木牛”，那是用在战争上的，这里不说功能，单说制作工艺，可谓和用在农业灌溉上的水车同工异曲。或许水车还在使用，我在河滩下滩村那轮大水车看到了引水的闸门，输水的木渠，至于引到哪里去灌溉我不知道；水车或许已经成为一个装置，远看取形状，圆和长、方的组合，近观有构成，轴承穿插、支架独特。其结构精巧、造型独特、轴承架穿插，疏密搭配得当，很有审美意义。



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 杨扬作

古代的工艺，是不是还得保留一下，让我们的后代也看一看这个发展的流程。

黄河边的桃花开了，柳树也绽出了嫩芽，虽然只是零星的几棵，然在灰褐色山体的映衬下，忽然有了亮丽，使你看到了春天的生机。和这灰灰地地最协调的是梨花，北长滩一带有许多三百多年的老梨树。一到春天，白色的花布满黄河畔，直引得人们拖家带小，偕友前来观赏，此情此景，虽不及日本东京上野公园樱花，武汉大学樱花的观赏阵势，但也有几分热闹可观。



那阵风沙扬起，吹来一阵小雨，春来带雨梨花开。细雨不大，却也润湿了土，剔透了晶莹的白花，小雨挂在了花瓣的尖尖上，还真有诗意。想起当年诗人岑参将塞外的雪喻为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想来那时观赏梨花已经很盛行了。白色的梨花在灰色的山和土色的民居中显得十分动人，那是因为白色在一片灰色中凸显了亮点。

我想起了白色的樱花，盛开时清冷、纯洁，那种白色让人心醉，而风吹花落，地上铺满花瓣，则是一种凄美；同样是白色的梨花，开在春风中显得朴拙、厚实，就像从泥坯房里走出的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，若是花瓣吹下，则飘入黄河，跟着拐了个弯，向东流去。

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，钱庄业何去何从？身份殊异的钱庄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金融职能，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洗礼。

进城的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，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“上海滩钱业巨子”秦润卿百感交集。秦润卿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，在顺流、逆流中引领钱庄业砥砺前行。从钱庄学徒、跑街干起，秦润卿在福源钱庄摸爬滚打，一干就是32年，直至晋升为经理。

与钱庄一道跨进新时代的秦润卿，从私营钱业的联营、联管到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，都表示出对新政策积极拥护的态度，被人民政府评价为“上海钱业界的元老，极有威望”。1950年初，为解决新中国的

财政困难，国家推出“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”。发行伊始，“共和国掌舵”陈云预判到重重障碍：“目前工商业尚未正常生产和经营，公债派下去可能会‘叫’的。”然而，秦润卿非但没“叫”，自家的福源钱庄率先认购了15000份，价值旧币2.5亿元，还动员沪上金融同业“运用集体的力量，量力分担，聚沙成塔”，超额完成206万份的认购任务，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赞不绝口，称其为“金融模范”。

无独有偶，朝鲜战争爆发后，福源钱庄经理又自掏腰包，共同捐献1000万元，鼎力支持抗美援朝运动。

众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上海解放初期，私营棉纺织业遇到资金困难“嗷嗷待哺”，而钱业好似“夜行迷路”贷款缺

失方向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牵头搭桥之下，开展了两次以私营钱庄为“主力阵容”的联合放款业务，引导减少私营金融机构投资的盲目性：一次加盟的钱庄最多，共有存德、顺康、元盛、聚康兴、惠昌源等钱庄

挥别最后的钱庄

黄沂海

76家，筹措贷款10亿元；另一次放款金额最大，计有宝丰、福源、振泰、信裕泰等钱庄28家，集聚资金100亿元。而后一次因有公营银行注入贷款，碰撞出“公私合营”的第一道火花。

穿新鞋，走新路，成为那个时期私营金融业主的行为自觉。自上海财经金融工会挂牌

成立后，秦润卿执掌的福源钱庄也建立了基层工会，钱庄64名职员全部入会。事实上，秦润卿一贯作风务实低调，为人谦和亲民，与职员们“朝夕相处，感情深密”，他表示“希望每日晚上谈话，不分阶级，不拘礼教，坦白地交换意见”。工会的成立逐步取代了原先的董事会，钱庄职员坐进了本来只有董事、经理才能入席的会场，提高了职工在钱庄中的地位，当涉及公私关系的纠纷时，由劳资协商会议用“公私协商”的办法解决。钱庄每年还按职工工资比例提取文教经费，用于工余开设银行信贷、合作经济、速记、俄文等课程的文化培训。

秦润卿依然蛰居在闸北海宁路浙江路口一个叫“咸宁里”的日式石库门弄堂里。即

便年事已高，德隆望尊，他仍每天坚持步行到钱庄视事。有人劝秦润卿在家里多多休息，有事可以上门请教，他说：“人民政府对我这么关怀照顾，我怎能无功受禄？”

早于整个工商业的公私合营，1952年，私营银钱业最先实现全行业改造，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破土而出，秦润卿被推选为副董事长，那一年他已经76岁了。同年7月1日，他把钱庄厚厚的账册移交给了黄浦区政府财贸办公室，还将自家的藏书楼“抹云楼”房产以及4万余册家藏图书捐赠国家。

从此，上海的钱庄作为一个历史名词，被收进了金融词典。

上海刚解放，出世半载的第一版人民币就将在这里流通使用。

十日谈

上海的早晨 责编:龚建星